

朱熹仕隐心态探微

陈必应, 郝永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朱熹生七十一年, 五十年间历事四朝, 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 儒、佛、老皆有所影响, 且受其“公体正用, 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 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 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 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 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 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 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 在“进”与“退”的经历中, 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关键词] 朱熹; 仕隐心态; 公正思想; 佛老思想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1) 01-0093-07

中国古代士人追求“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1]495}, 但又有“道丧之时, 上士乃隐”^{[2]29}之语, 故而对仕隐的选择始终是古代士人内心的一对矛盾, 每及道丧世衰之际, 此种仕隐心态表现尤甚。两宋之际, 随着儒学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哲学, 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3]2}, 即理学。在理学发展过程中, 朱熹作为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思想, 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 可说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3]4}南宋时期的理学诠释“虽然注重对心性理命的探讨, 但其学术归宿在于经世致用”^{[4]3}, 故而理学熏陶之下的士人皆有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5]的终极关怀。而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6]1}, 朱熹五十年间历事四朝, 有着曲折丰富的仕宦经历, 其仕隐心态于诗文之间亦多有体现。通过对朱熹诗文的解读, 可以一窥其仕隐心态的变化历程及其原因、影响, 此不仅有助于对朱熹著作的理解, 更可观其生平、学术与思想。

一、“达”与“穷”的冲突

沈松勤在《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认为: “作为参政主体, 南宋文人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人格。”^{[6]3}朱熹之父朱松一生宦海浮沉, 朱熹为其在忧患之间所生的第三子, 观朱松为年少朱熹所作之诗, 多有“有子添丁助征戍, 肯令辛苦更儒冠”^{[7]44}“努力诵书史, 从人笑翁夸”^{[7]24}之语, 足见朱松在朱熹年少之时便对其寄予厚望。而朱熹一生的政治生涯, “自筮仕到逝世, 凡五十年。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其间, ‘士于外者仅九考’, 立于朝者四十日。其余四十年, 都奉祠。”^{[8]379}计其一生从政“累计方愈七年”“奉祠二十一载”^{[9]60}, 虽实际在任时间不长, 但五十年间历事四朝, 辞官达四十余次, 政治历程可谓曲折, 仕隐之变亦颇反复。

既处衰世仕途之间, 则必有顺逆达穷之变。《孟子·尽心上》有言: “故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穷不失义, 故士得己焉; 达不离道, 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10]593}自孟子之后,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的

[收稿日期] 2020-06-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9FZXB067)

[作者简介] 陈必应 (1994—), 男, 贵州遵义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献研究。

郝永 (1975—), 男, 河南永城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朱子学、阳明学研究。

理念成为从政士人的人生信条。但在政治仕途上,“达”与“穷”、“兼济”与“独善”之间并非断然为二的存在,更多时候有着其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朱熹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一) 兼济天下的抱负

朱熹有着强烈的兼济天下之抱负,他以一代理学宗师积极投身于仕途,辗转于朝野之间,徘徊于党争之间,这除了受其父其师的影响之外,亦与其期盼拯黎民于水火、挽大厦于将倾以至“我愿君王发天造”^{[11]646}的抱负有关。绍熙五年(1194)朱熹除焕章阁待制,曾对门人感慨陈言:“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人主无不可进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当不俟驾而往,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此外非吾所能预计也。”^{[12]195}言辞之间有为天下以身明道、不畏斧钺的使命感。

这种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家族传承有极大关系。朱熹祖父朱森一生穷困潦倒,但时常训诫后辈:“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飭,以无坠先世之业。”^{[7]89}终其一生虽然“家既素单,久而益急”^{[7]89},但却“家人生产未尝挂齿”^{[7]89}“恍然有超世之志”^{[7]90}。其父朱松自言:“江南鄙夫也,家无伏腊之给,而有俯仰之养。”^{[7]72}在朱熹的成长过程中,朱松的家国情怀对其影响深远,朱熹曾追忆朱松说:“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慨然久之。”^{[13]5291}又加之朱熹师从武夷三先生及李侗,受他们的影响,养成了“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11]895}的情操和“收身千里卿相,归把钓鱼钩”^{[11]895}的人生志趣。

在朱熹五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士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8]379},但无论身处朝野或官阶高低,皆能克己奉公、励精求治,其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彰显无遗。如其在同安任上推行经界以正本原,减免税赋以轻民负,体察民瘼以安民众,振教兴学以淳风俗。正是在“敦礼仪、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13]4724}的治县之法下,同安县况大盛于前。而且在“忠君”与“为民”之间,朱熹急民之疾甚至重于忠君之命,对此,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指出:

但他终于看到这种忠于君事却反使百姓陷入更深的贫穷困苦中:“输尽王租生理微。”“忠君”又走向了“爱民”的反面。这种痛苦矛盾使他初入仕途便产生了浓重的厌倦官场情绪,发

出了“不堪从吏役,憔悴欲归休”的灵魂呻吟。^{[14]12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爱民”之重甚至过于“忠君”之念,但并不意味着完全站在“忠君”的对立面。如其在淳熙十五年(1188)所上《戊申封事》中,针对“今日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13]461}的严峻现实,提出了“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13]461-462}的六条当务之策,更是指出:

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斧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13]481}

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剝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13]486}

朱熹对南宋衰弊的症结认识极为深刻,所提出的施政之策亦极中肯切实,包括其在任上的恪尽职守和疏奏间的忧心所虑,实则皆是出于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虽然“忠君”与“爱民”时常有所对立,且朱熹对“爱民”一边较有所偏重,但并非把自己置于“忠君”之对立面,而是辗转朝野之间、党争之中企图寻求“忠君”与“爱民”的平衡点。换言之,其“忠君”“爱民”皆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出于对南宋社会的考量,是其“公体正用”公正思想的实践,“这里的‘公’是公而无私的心理状态,即‘公心’;‘正’是正义的行为规范,即‘正理’。”^{[15]98}自然,这种“公体正用”思想也是朱熹“兼济天下”人生抱负的体现。正是出于“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而行于仕途,故朱熹一生虽多有贬谪、禁锢,但无论是其任下的底层百姓还是人君、同僚,皆对其有所嘉评。如在其浙东任上所为,与之学术上有所分歧的陆九渊称其大节殊伟,《宋史》亦云朱熹政事可观:

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糖与正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议论中间不免纷纭,今日是非已渐明白。^[16]

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

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17]

南宋党争激烈,朱熹又深陷其间,况多有得罪同僚、宰执、人君之举,若非其从政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实在难得如此评价。纵使老来遭遇党禁之祸,亦多有献言献策。终其一生虽未显达,然长存“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之念^{[13]94},忠君爱民之心不减,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亦未曾有灭。

(二) 独善其身的无奈

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118}之言,庄子有“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18]604}之志。朱熹的态度有所不同,即使身不在仕,处山野间,他对南宋社会局势和朝政动态依旧保持关注。但毕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每当朱熹对仕途有感失望之时,便由向外的“兼济天下”转向内省的“独善其身”,但同时并不放弃对社会朝局的关注。

换言之,朱熹的“独善其身”不是作为一个隐士的角色遗世独立,而是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官职高低,都强调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在此前提之下才能更好做到“兼济天下”。朱熹不仅要求自己“独善其身”,而且对同僚甚至君王皆一致强调。就朱熹一生的实际仕途经历而言,其政治主张被重视采纳的其实并不多,而其学术主张及振教兴学之举却甚有成效,这也可见其“独善其身”是出于仕途幽险的无奈选择。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南下赴任同安主簿,在同安任上虽然有正经界、论经总制钱、整顿税赋等诸多举措作为,但“输尽王租生理微”^{[11]918}的现实使得朱熹产生了“不堪从吏役,憔悴欲归休”^{[13]45}的痛苦心理。对于政事的厌倦使他转而把疗救南宋积症的目光转向了教育与学术,希冀以理学良方疗救天下、挽救衰世:

在同安,朱熹开始渐渐相信不是佛学和老学,而是理学,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了。他以同安主簿兼主学事,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整顿县学教育上,想把他作为主簿没有能解决的“敦礼仪,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的社会问题,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来实现。^{[14]128-129}

朱熹渴望通过兴教崇学、挽救人心来拯救南

宋衰弊的社会现实,他于同安任上振兴儒学教育的举措包括重建书斋、授课教学、鼓励后进、购藏书籍等,鼓励学子抛弃读书求学只为跳却场屋、入仕做官的理念。总而言之,在同安任上的所见与朱熹“公体正用”的公正思想有所抵触,朱熹有感于“个体的自以为‘公心’而不求和‘正理’的符合,是‘公而不正’的不完全公正;仅以个体所谓的‘正理’指导实践,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心,则是‘正而不公’的不完全公正”。^{[15]98}因此,朱熹产生了对于腐败官场的厌倦情绪,转而致力于通过对人心的拯救来改变现实。由己及人,由自我的“独善其身”致力于衰世之间人心的“善”,是一种沉闷现实之下的无奈选择。在朱熹一生的七十余年间,仕途上“穷”的境遇是常态,在其晚年,其学说为诬为“伪学”,以道学党魁身份列于党禁名录,加之老年多病、亲旧凋零,日暮穷途之感充溢其诗文之间,“处穷”的悲剧命运伴随一生。

朱熹一生仕途起起落落,每当感于“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无望之下,便转而致力于振兴教育、著书立说、挽救人心道德。而无论是“兼济天下”或是“独善其身”,都是出于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驱使。但南宋衰世的症结早已病入膏肓,及至晚年,在庆元党禁的一片压抑气氛之下,朱熹深感“政使暮年穷到骨”^{[11]846},自己一生的努力也只能落得个“且将余日付残编”^{[11]849}了。

二、“仕”与“隐”的矛盾

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不仕无义。“仕”既是古代士人阶层上升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生抱负、求得青史留名的重要途径,故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成为学子士人共识。但宦海浮沉、仕途多舛,从仕之人多有“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19]的际遇,对此又有“道丧之时,上士乃隐”^{[2]29}“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118}之言。可见,“仕”与“隐”的矛盾古已有之,而每当德政不举、俗恶道丧之世,这种矛盾便越发加深。朱熹一生师承儒业,又从道谦之流入入佛老之间,思想接受颇为驳杂,儒与佛老随其一生,在其仕隐心态上也影响匪浅。《白

鹿洞赋》《感春赋》分别作于朱熹仕、隐之时,通过对两赋的梳理解构,便可一窥其“仕”与“隐”之矛盾,及此种矛盾之下的痛苦心理。

(一)“仕”的儒者情怀

儒家自创立之初便有着强烈的入仕精神,孔子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1]476},孟子主张“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0]126}。婺源朱氏世习儒业,作为儒者与理学家,朱熹亦传承了这种儒者情怀。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及其《白鹿洞赋》的创作,就是这种儒者情怀的体现。孝宗淳熙五年(1178),在丞相史浩的推荐下,朝廷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期间重修白鹿洞书院,于淳熙七年(1180)三月作《白鹿洞赋》。对于此段经历,《白鹿洞赋》序云:“《白鹿洞赋》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即复作书院洞中,又赋其事,以示学者。”^{[13]2}《孟子·万章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0]484}同样,如果对朱熹自知南康军到创作《白鹿洞赋》期间的事迹加以梳理,就可以发现此赋并非仅仅言物纪事之辞,其中饱含“仕”之情怀与“士”之担当抱负。

朱熹是在众人对此行既可承领朝家美意,又可泽及一方,使世少见儒者之效的期盼之中赴南康任的。“士大夫期待朱熹做出大儒的非凡政绩,使他的‘见儒者之效’‘愿反振民功’的勃勃雄心炽热起来。”^{[14]402}实际上朱熹的出任是淳熙中道学与反道学的党争结果,而作为同道之士自然对此大有所望,朱熹先是上辞免状不被许,则亦期盼于南康任上有所作为。所以在其上任之初的《知南康榜文》中,对南康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朱熹对南康军的现实认识颇深,指出南康的主要问题在于:

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前后长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宽恤民力,实缘上供官物既已浩瀚,军用所资亦复不少,只得逐急了办目前,更无余力可以议此。是致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13]5051-5052}

患在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日陷偷薄。^{[13]5052}

而比年以来,士风衰弊,而学校养士不过三

十人,大比应书,人数亦少。^{[13]5053}

针对南康土瘠民稀、役烦税重、士风衰弊的现实,朱熹一面上疏请求蠲减税赋,一面制约强宗豪右,惩戒贪官奸吏。但蠲减税赋已是几多曲折,官吏豪强相互勾结关系错综复杂,虽然朱熹自言:“必欲使某喂啖虎狼,保养蛇蜥,使奸滑肆行,无所畏惮,而得歌颂之声洋溢远近,则亦平生素心所不为也”^{[13]5488},但“他面临的反对力量上起朝廷权臣,下至监司要员、县衙奸吏和乡里豪横,几乎是以一个认真得过于迂阔的道学知军在同他们作悬殊的抗争”^{[14]407},所以他在南康军的社会改革意料之中地失败了。

正是在南康任上改革的失败,让朱熹看到了土瘠民稀、役烦税重的症结所在却又无能为力,使之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无力感。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朱熹在宽民力上受到上上下下或明或暗的种种掣肘,在敦厉民风士气上他倒可以以一郡之长放手在南康雷厉风行”^{[14]407}正是出于对“师帅不良,不加敦劝,是致颓靡,日陷偷薄”^{[13]5052}“比年以来,士风衰弊”^{[13]5053}的现状的考量,朱熹主持重修了白鹿洞书院且自任洞主,除向朝廷请赐经书外,还“徧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这一切皆是在主政碰壁现实下的努力,正如《白鹿洞赋》中所言:“往者弗及,余心忧兮,来者有继,我将焉求兮?”^{[13]4}“‘公心’靠涵养以成,‘正理’以读儒家经典而得,落脚点是实践的检验,这是朱熹哲学体系中的本有之义”^{[15]98},既然身在其位,则必恪尽职守、克己奉公,以求无愧于心,这是朱熹儒者情怀的充分体现。

(二)“隐”与佛老出入

虽然朱熹以儒者及理学家之名垂范后世,但其思想并非仅有对“儒”的继承,“朱熹的学术来源非常广博,不但有孔孟以来的诸儒之学,还有佛老之学、史学、子学、文学等,可以说是综罗百代,集诸儒之大承。”^[20]朱熹早年师从有“武夷三先生”之称的刘勉之、胡宪、刘子翥,此三人对佛禅亦有所研究,三子皆不能不杂于禅,及后师从延平李侗,亦多如此。所以朱熹的思想构成极其丰富广泛,“除了孔孟之后的诸儒经学,还有当时著名学者的经学及其思想,包括佛老之学,最终整合、熔铸诸说为一体,成一家

之言。”^{[4]139}而在这些思想构成中,佛老之学的出入对其仕隐心态影响最深。限于篇幅,在此以《感春赋》的创作为例说明其“隐”与佛老出入之关系。

淳熙九年(1182),朱熹除浙东提举巡历浙东,七月入台州城,六劾知州唐仲友于灾荒之年催逼租税、贪盗残民、植党淫恶。但在错综复杂的党争乱局下,唐仲友弟妇又为宰相王淮之妹,终于奏劾无过反被罢归武夷。淳熙十年(1183),朱熹“经始武夷精舍于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作感春赋以寄不忘忧世之意”。^{[21]759}是赋作在春初,赋云:

触世涂之幽险兮,揽余轡其安之。慨埋轮而縶马兮,指故山以为期。仰皇鉴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犹未替。抑重巽于既申兮,狗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还归兮,毕藏英而发春。潜林庐以静处兮,闾蓬户其无人。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往哲之明训。嗒掩卷以忘言兮,纳遐情于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赓之以清琴。夫何千载之遥遥兮,乃独有会于余心。忽嚶鸣其悦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彼美人之修嫜兮,超独处乎明光。结丹霞以为绶兮,佩明月而为珰。怅佳辰之不可再兮,怀德音之不可忘。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子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13]4-5}

感春为赋作之传统题材,但朱熹此作非仅传统之感春赋,而是以赋言志,恍然有《归去来兮辞》中“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22]之感。结合淳熙十年(1183)前后朱熹的政治遭遇经历,更能从中解读出其“隐”的心态及对佛老的纳受。

六劾唐仲友这场斗争的失败,在使得朱熹被罢归的同时,还在朝堂之间掀起了一场“反道学”的潮流,以致朝中言论纷起。有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12]者,或曰:“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12],在这样交困的背景下,朱熹“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作感春赋以见意。”^{[21]759}

朱熹在《感春赋》中深感仕途之幽险,心

念旧土故山,受其佛老无为而隐思想的影响,直有“潜林庐以静处”以达“狗耕野之初志”的想法。但作为有担当使命感的理学家与入仕的儒者,这种逃避现实、归隐山林的想法只是一时的流露。所以在其五十年的从政生涯之中,虽然起起落落、辞官达四十余次,但往往在“仕”与“隐”之间往返徘徊。这种“仕”与“隐”的仕隐心态矛盾加剧了其内心的纠结与痛苦,亦是其“儒”与“佛老思想”交激的反映。但就总体而言,在朱熹一生的仕宦经历当中,作为儒者的“仕”的观念是在其佛老思想“隐”观念之上的。

三、“进”“退”两适的仕隐心态建构

古人认为“世乱,贤者宜隐而全身,圣人宜出而宏物”^[23],南宋之际时乱世衰,而朱熹作为当时的“贤者”及后世的“圣人”,于仕则多见不平不受重用,于隐则心有不甘忧心忡忡,与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24]的心境颇为相似。但作为理学家,朱熹对南宋衰世积弊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深明症结已久病入膏肓,所有的改革和努力亦只是“以一盃水救一车薪之火,无以异于小儿之戏论,甚可笑也。”^{[13]5384}又加之佛老思想的影响,朱熹对“仕”与“隐”有着较时人更加明白的看法,逐渐构建起其进则尽人臣之责、退则求一心之安的进退两适的仕隐心态。

(一) 进尽人臣之责

朱熹之父朱松晚年于绍兴十年(1140)因反对议和及得罪秦桧一党而被外放,当时秦党专权,忠贞之臣多相随去国,此等场景朱熹直至晚年记忆犹新:“绍兴中年奸凶擅权,忠贤奔播时事……如李、曾、二胡,诸公皆先人所从游,当日相随去国者。三复其言,益以慨叹。”^{[13]4257}朱熹少时随伴身旁,朱松的爱国情怀对其潜移默化,对朱熹后来的仕途生涯影响极大。朱松又好读《左传》,多以春秋大义教育朱熹,“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13]4248}“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13]4248}正是朱松对朱熹幼年的教育及熏陶,奠定了朱熹一生的忠君爱

国、忧国忧民情怀的基础。

虽然朱熹多感于仕途幽险,但观其凡在任上,皆无不恪尽职守、克己奉公,且其政绩多有可观者。又在南宋党争乱局之中,政治见解多独到深刻,对敌主张积极御敌恢复故土,对内为民而敢谏诤言,绝不作从众之流,亦不为庸碌之辈。凡此一切,实则都是在尽其为人臣之责,“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此外非吾所能预计也。”^{[12]195}

如朱熹在同安任上,面对土地兼并严重及其导致的隐田漏税、税赋不均问题,因涉及强宗豪室,官员多无计可施,“是时已见本州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推究。”^{[13]870}针对这种局面,朱熹在《境界申诸司状》中主张“绍兴已行之法诚不可易”^{[13]872},但对其中的“一二谓尽善者”^{[13]872}则须加以改进,如注意官吏选派及加强监督等,对图账的绘制也要“各得其实”。^{[13]873}又针对税赋过重的问题上疏力争,如其在《与钟户部论亏欠经总制钱书》中认为朝廷征收经总制钱“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民耳”“与盗钟掩耳之见无异”。^{[13]1008}此外,诸如振兴县学、传授技艺、敦化风俗等作为,无不皆是出于对尽人臣之责的责任感。

南宋建立之初,“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潜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淮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25]纵观南宋一朝,对和战之议的争论从未消停,或和或战的态度也成为了判断忠奸、分辨党争阵营的标线。与其父朱松一样,朱熹坚定主战而反对苟安,但朱熹主战并非是出于党争需要而盲目站队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时局的深刻认识,是出于其“忠君爱国、尽人臣责”思想下的大局利益考虑。对此,朱熹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所上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言:

彼盗有中原,岁取金币,据全盛之势,以制和与不和之权;少懦则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13]443}

对敌而言,议和不过缓兵之策,而南宋若不能把握战和的主动权,则只能任敌蚕食鲸吞。对此,主和一派未尝不曾意识到,只不过出于私利而不惜贻害国家,所以朱熹在《与陈侍郎书》

中对此不讳直言、大加鞭挞:

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怀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敌国来诉之望者,讲和之说也;苟适目前宵旰之忧,而养成异日宴安之毒者,亦讲和之说也!^{[13]1022}

在朱熹从仕的五十年间,其身所历四朝,然其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其敢谏诤言、不避圣威的性格关系极大。但观其一生从仕经历,所作所为无不出于爱国忧民之情,亦是其“进尽人臣之责”的充分体现。

(二) 退求一心之安

无论是从朱熹七十一年的人生经历,还是从五十年间的仕途生涯来看,其“累计方愈七年”^{[13]60}的出仕时间都不算长。所以在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内,朱熹其实是以一个学者、文人的身份存在着的,但这种“退”之下的朱熹依旧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相对于在“进”时有“尽人臣之责”的责任感与负担,“退”之后的朱熹或潜心于学术传授,或忧心于朝局时势,都是一种自觉的出于本心的行为,以得到“俯仰自得,心安体舒”^{[13]4367}的效果。

不在仕任之上的朱熹,其生活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交游、著述、授学。因其既不在仕任之上,心中少许多牵绊困扰,故而更见其真情性。在入侍经筵四十六日被罢免后,曾一度黯然失落的朱熹“很快恢复了心理的平衡,他的君臣不遇的失落感又重新被穷理倡道的自我超越所替代。”^{[14]931}其在《书钓台壁间何人所题后》中所录(实则亦其自作)的《水调歌头》一词,便充分展现出这种摆脱俗务之后的轻松感与自由感:

不见严夫子,寂寞富春山。空余千太危石,高插暮云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两忘身世,来把钓鱼竿。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中兴主,功业就,鬓毛斑。驰驱一世豪杰,相与济时艰。独委狂奴心事,不羨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14]932}

朱熹入侍经筵得力于新君宁宗赵扩旧臣的推荐,如黄裳、碰龟年等言:“若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人乃可。”^{[12]135}“陛下若招徕一世之杰如朱熹辈,方厌人望。”^[26]

在这样的情形下,朱熹的政治热情再一次被点燃,在入都之前慷慨陈言:

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必有恶衣服、菲饮食、卑宫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为乐,然后庶几积诚尽孝,默通潜格,天人和同,方可有为……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人主无不可进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当不俟驾而往,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此外非吾所能预计也。^{[12]195}

但招徕朱熹既然本就只为新君“以厌人望”的拢心之举,在朱熹七次进讲而又不受所喜之后,入侍经筵四十六日之后的朱熹被一纸“内批”罢归。故《水调歌头》词内“不似林间翮,飞倦始知还”^{[14]932}之语应指此经历。但通过人生的最后一次入仕,朱熹既已明白“世人的最大痼疾,就是徒唱空言,不肯实做,上自皇帝宰执,下至阉竖小人,无不如此”^{[14]932},所以反而“不羡痴儿鼎足,放去任疏顽。爽气动星斗,终古照林峦”^{[14]932},落得个轻松自在了。仕途之“穷”是朱熹从政的常境,而“退”则是对这种“穷”境绝望后的自我选择。

入侍经筵是朱熹最后一次入仕,随后不久的庆元党禁出炉,朱熹名列其间直至病逝。正是对南宋衰世积弊症结的深刻认识,使朱熹养成了宠辱不惊的仕隐心态。若是得遇所用,则不管官职大小,皆恪尽职守以尽人臣之责。如若退归山野,便著书立说、交友授学,亦落得一心之安。在朱熹生命的最后时期,“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11]849},但回顾一生,无论是达是穷、是仕是隐、是进是退,既然无愧于心,也就不负此生生了。

[参考文献]

- [1] 杨树达. 论语疏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庾桑楚. 亢仓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蒙培元. 理学的演变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 [4] 姜海军. 南宋经学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5] 张载. 张载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320.
- [6] 沈松勤. 南宋文人与党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7] 朱松. 韦斋集 [M]. 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 [8] 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9] 高令印. 朱熹事迹考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焦循. 孟子正义 [M]. //诸子集成.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11] 郭齐. 朱熹诗词编年笺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 [12] 王懋竑. 宋朱子年谱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 [13] 朱熹. 朱熹集 [M]. 郭齐, 尹波, 点校.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 [14] 束景南. 朱子大传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 [15] 郝永. 公体正用, 体用一如——朱熹的公正哲学及其三维建构 [J]. 古代文明, 2016 (4): 95 - 104.
- [16] 陆九渊. 陆九渊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97.
- [17] 脱脱, 等.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9968.
- [18] 郭庆藩. 庄子集释 [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9] 韩愈. 韩昌黎全集 [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5: 408.
- [20] 高令印, 高秀华. 朱子学通论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10.
- [21] 束景南. 朱熹年谱长编: 卷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2]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460.
- [23] 皇侃. 论语集解义疏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260.
- [24]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195.
- [25] 庄绰. 鸡肋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4.
- [26] 楼钥. 攻媿集 [M].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870.

(下转第136页)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ime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s

ZHANG Pin-ge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time structure mainly includes tense, aspect and time. As a typical isolated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lacks morphological changes. Therefore, the time structure division and expression in Chinese language is of som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languages. In addition, Chinese language mainly relies on lexical means to express time, and is relatively flexible. Since the 1920s, academic studies on Chinese time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mode have focused on whether there is a division of “tense” and “aspect” and what “tense” and “aspect” markers there are.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time expressions focus on Chinese time word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time structure; expression; research review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99 页)

A Probe into Zhu Xi’s Mindset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s

CHEN Bi-ying, HAO Y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Zhu Xi experienced four dynasties in the 50 years, and died at the age of 71. He underwent a lot of hardships in his political career. And his mindset of serving as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al life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complex thought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Lao Zi’s philosophy, but his own thoughts of justice, which believe that the devotion to the public interests is the essence and should be fulfilled with righteous behaviors. First, he pursued “public fairness”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change of “success” and “poverty”. When prosperous, he had an ambition of benefiting the society; in poverty, he still held his self-cultivation to a high standard. Second, he stuck to the principle of “devotion to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righteous behaviors” in the contradiction of being official and retire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Lao Zi’s thoughts also affected his mentality profoundly. Third, his mindset was created in the process of “entering the imperial court” when he devoted himself to his work, and “retiring from the official life” when he desired an inner peace.

Key words: Zhu Xi; mindset of being an official and retiring from politics; justice thought; Buddhism and Lao Zi’s thoughts

(责任编辑 陈蒙腰)